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与 “现代化”共识的形成

左玉河

【提要】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论战过程中，双方既不断批评对方的主张，更加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又不断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西化派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开始从主张“全盘西化”转向“现代化”；中国本位文化派则表示自己并不主张复古守旧，进而认同西化和“现代化”。这样，双方的观点越来越明朗化，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共识。人们逐渐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中西文化真正进入了沟通融合以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本位文化 现代化 西化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5-0139-06

19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的论战，是五四以后众多文化论战中影响较大者，学术界围绕着这场论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人们论述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对两派文化论战具体过程的表述上，比较着力于两派文化主张的具体阐述和价值评判上，很少注意到两派论战过程中在“现代化”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本文拟在比较两派在这场论战提出的文化主张异同之基础上，重点考察双方是怎样不断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进而在“现代化”问题上形成共识。

一、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争论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黄文山等10位教授在上海

《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对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作了基本估计，认为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新思潮的传播，“中国在文化领域消失了，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些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发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为了使中国重新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为了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

如何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

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努力。”

循着这种认识前进,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该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所讲的这些文字看起来比较平实公正,“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似无大错,并且提倡从中国现实的需要来吸取西方文化,也貌似公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中国当前究竟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在十教授看来,目前存在的三种西方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均不合于中国的国情。《宣言》矛头主要是指向“反传统”的“西化派”,其基本倾向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折衷调和。故胡适在其《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指出:“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本位文化’,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守旧心理在作怪”,“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①胡适的看法显然是准确的。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轩然大波。各地纷纷举行座谈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对《宣言》进行了尖锐的批驳,从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多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与全盘西化论的激烈争论。

1935年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晚清“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是张之洞《劝学篇》的翻版:“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十教授所谓“不守旧、不盲从”,其实是“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掩饰下的文化复古,并将其视为“反动空气”的时髦表现;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

英”、“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时髦论调,都不过是遮掩其保守心理的烟幕弹。胡适指出,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而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他指出:“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所谓本位就是“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不论制度是如何的变,物质生活是如何的变,思想学术是如何的变,“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借西方文化的清新空气,以打掉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而不是维持那个“中国本位”。

陈序经赞同胡适的观点,指出十教授声称“不守旧”,但事实上却偏于复古、近于复古;认为《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他认为,对于已经落后的中国文化来说,最要紧的是要认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而任何坚持中国特殊的理由,都只能成为复古和倒退的借口。所以,他主张在目前的情势下,为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与其主张折衷调和,不如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全盘西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到了尽善尽美的地位。其立论的基本根据是,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趋势和环境,故不得不彻底将其全盘西化。这里的西化尤其是全盘西化不是别的,而是世界化和现代化。陈认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于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他坚信百分之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③

① 《独立评论》1935年第145号。

②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第145号。

③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

在胡适、陈序经等人看来，中国“百事不如人，只有死心踏地向人家学。”胡适说：“我们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人家比我们强。”^①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后肯用全力去消灾灭罪；认清了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踏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②陈序经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中也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不如西洋文化优美，而更不合于现代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全盘西化。”在他看来，全盘西化之后，中国社会才能有长足的进步。其云：全盘西化，也许免不去西洋文化的短处，可是假使我们而承认西洋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六十，中国文化之长为百分之四十，我们若能全盘西化，则我们至少有了二十分的进步，因而比之一般希望以西洋文化之长而调和于中国文化之长，而结果却是取人之短，留己之短的危险，相去之远，可以想见。^③

1935年5月10日，在社会各方批评之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不守旧、不盲从”、“此时此地的需要”等论点作了集中辩解。他们力辨“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认为“中体西用”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个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何谓中国本位？他们的解释是：“我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缺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以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的创造。”何谓不守旧和不盲从？他们的解释是：“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地的环境，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何谓“此时此地的需要”？他们将其解释为：“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关于“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态度”，他们的回应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

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④

但这样的解释仍然难以令人赞同。严既澄诘难说，如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他再次声明：“今日惟一的表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力的路径，只有本孔子的‘好学不倦’，孟子的‘取人为善’的精神，去尽可能地学取在今世的一切强国中已著成效的东西——一切学问智识、文物制度、方法组织都包含在内。换言之，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⑤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⑥由于十教授宣言有陈立夫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背景，故当时许多人将其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视为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的政治需要。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

一场思想文化论战，不比一场军事战争，它无法用“胜利”与“失败”这样简单的术语概括其结果。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思想文化论战的结果，往往表面上是“不了了之”，而实际上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一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具体到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与全盘西化派的论战，这种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论战双方既不断批评对方的主张，更加清晰地阐明自己的

① 胡适：《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1934年第103号。

②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1934年第105号。

③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

④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8期。

⑤ 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大公报》1935年5月23日。

⑥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天津《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23期。

意见,又不断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双方的观点越来越明朗化,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共识。

西化派在这场文化论战中,吸收了中国本位文化派的合理观点和中肯的批评意见,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不断的反思,逐渐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开始从主张“全盘西化”转向“现代化”。张熙若指出,今日中国大部分的事物都日趋“西化”或“现代化”了,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化与西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提法。在他看来,“西化”差不多就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而“现代化”则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并且大部分是指“西化”,但“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

张熙若对“西化”的看法是:现在完全受科学支配的事情应于最短期间极端西化;应该全受科学支配而现在尚未如此的事应努力使它尽量西化;将来是否能完全受科学支配现在尚有疑义的事,可以西化,也可以不必西化,但必须趋于“现代化”。可见,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但“西化”仅仅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模式,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完全照抄西方模式,可以有他种模式。既然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便没有必要完全照抄西方,而应该从四方面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是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文化的根本基础;二是促进现代工业,这是现代国家生存的基础;三是提倡各种现代学术,这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四是思想、态度和做事方法的科学化,这是成为现代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学术、工业及思想方法诸方面实现“科学化”。^①张熙若的这些见解,跳出了“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间不必要的概念纠缠,厘清了“西

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视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目标,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和精辟的。

严既澄指出,如今世界上的一切学问、智识、文物、制度均已成为世界之公器,我们既为人类的一部分,就不应该因为所居地点的关系而妄为区别,把人类划分成东西两部,西方文明引领着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与“西化”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他也看到,“西化”名词容易引起国粹主义者的反感,赞同将其改为“现代化”;而“全盘”两字更容易引起误会,最好也改为“尽量”二字。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基本上具有普适价值,故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效法西方,“尽量西化”。他指出:“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因为现代的强国都拥有这些制度文物智识学问,我们若要和他们并立于天地之间,便非学他们这些东西不可。要不然,我们自己先站不住脚,不必等人家来欺负,自己先已筋疲力竭地躺下来了——如所谓经济侵略之类。”他意识到,现代化既有通性的一面也有特性的一面。承认现代化有通性,就承认了现代性有可以普适的一面;承认现代化有特性,就不得不承认现代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现代化表现为不同的模式。故他主张,中国应该首先集中精力于建设方法的现代化,不管甚么制度文物,只要是力量做得到的,便应当毫无顾忌地勇往直前去学习西方;经过现代化之后,原有的种种特质可以与新的并行不悖的,让它去并行,与新的相冲突的,便以新的代替旧的。^②这样,中国既可以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又可以保持民族的“特质”。因此,“现代化”虽不等同于“西化”,而只是等同于“现代化”可以普适的一面,但仍然是以实质上的“西化”为主。

^①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天津《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23期。

^② 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大公报》1935年5月23日。

熊梦飞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地是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只有吸取西洋文化，才能使中国完成现代化，才能使中国生存于现代世界。这是几乎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他认为，西洋文化是代表着现代化方向的世界文化，中国学习西洋文化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谓西洋文化，从历史看，并非西洋人所可注册专利；从地域看，它已风行全球，除了将陈列博物院做人种标本之红色黑色种以外，几乎一律采用，可‘名正言顺’地唤作现代世界文化；我们之吸取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队伍中之一员大将。”但是，全盘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叶乎？熊梦飞认为，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和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中国现代化必须吸取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三是“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四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的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他将此四大原则称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坚信这是中国完成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西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这是必须“全盘吸取”的；西人的日常生活、历史遗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资本主义则必须摒弃；中国固有优美的文化如人生哲学、文学、美术、史学和医学，监察、考试制度等，需要利用西洋新法宝来改造，使之科学化、民主化或机械化，以适应现代生活。^①惟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可见，通过这场文化论战，西化派一方面逐渐修正了“全盘西化”的提法，倾向于使用“根本西化”、“大部分西化”、“从根上西化”、“从基础上西化”、“充分西化”、“尽量西化”、“更深刻更广泛地西化”、“充分世界化”、“一心

一意地现代化”等更恰当的提法，并逐渐以“现代化”取代容易引发争议的“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西化派逐渐认识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保持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主张在“西化”过程中还要尽量保持民族文化“特质”，开始认同保存和弘扬“固有的优美文化”。这样的认识，为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在这场文化论争中，也开始修正自己的某些观点，表示自己并不主张复古守旧，进而认同西化和“现代化”。“十教授”在《总答复》中，表示只是反对“全盘西化”而并不反对“西化”，逐渐向西化派靠拢。他们不主张复古守旧，认为：“复古的企图不但是抱残守阙，简直是自觅死路！我们倘认现代的中国人不容再营封建的生活，那就不应当持保守的态度来阻止文化的演进，还必须扶着时代的大轮，努力踏上日新又新的前程。”他们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表示：“外来文化果足为我们营养的资料，自当尽量吸收，但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一番审慎的选择，倘不顾时地的条件，贸然主张全盘西化，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况且，西方现存文化的自身，也何尝是个统一的整体？所谓承受全盘，究竟承受甚么东西？”^②因此，他们在“复古”与“西化”之间，实际上还是选择了“西化”。主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得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的刘絮敖，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不独化；不同化”原则。所谓“不独化”，是指“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可闭关自守的企求复古”；所谓“不同化”，是指“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主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刘氏本着“不独化不同化”原则，对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作了严厉批评，主张在“大量吸收欧美文化”时注意

^① 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9期。

^②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8期。

“中国化”。其云：“不顾世界实情，一味主张复古的人，不消说我们是誓死地反对；就是完全忘了自己，而主张全盘接受欧化的人，我们亦不能不表示惊奇！我们并不是欧美文化体下的附庸！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独立发展文化的使命！我们本来是有定型文化的民族，并非其他无文化民族之可以全盘接受外化者可比！我们吸收欧美文化，只为补我们固有文化之不足，所以我们虽可大量吸收欧美文化，但吸收过来，我们即须使其立刻中国化！我们不愿生吞！我们不愿活剥！我们不愿在我们的腹内，有一个可以顽梗致命的怪东西！我们更不愿我们吃了这个怪东西后，我们就根本化体为白皮色的欧美人！我们始终中国人，我们是有我们独立自尊的人格！”^①

由此可见，通过这场文化论战，中国本位文化派一方面逐渐修正了“中国文化本位”的提法，倾向于使用“中国本位”、“中国民族本位”、“中国国家本位”等提法，并公开声明“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针之一，应是不守旧，对

于任何复古的企图，都采取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赞同中国急需“采纳西洋的优美文化”，认同了西化派对“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将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指标。正是从这场文化论战开始，两派在“现代化”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人们逐渐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中西文化真正进入了沟通融合以创造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新阶段。

本文作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刘絮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9期。

Chinese Standard Culture Deb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zation” Consensus

Zuo Yuh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school and Westernized school in 1930s, both sides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views of the other side and clarified their own views more clearly, but also absorbed the reasonable ideas of the other side continuously and adjusted and revised their own views. The Westernized school recognized “modernization does not mean Westernization”, and began to substitute “modernization” for “total Westernization”; the Chinese standard culture school insisted they did not advocate retro and old fashion, thus identified with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is way, views of both sides became more and more clear, and gradually formed consensus on “modernization”. There is a growing use of “modernization” instead of “total Western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total Westerniza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in China’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ruly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reating Chinese modern new culture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Key words: standard culture;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